

# “海葵”洗礼了城市的抗灾新理念

四大节假日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消息公布后,社会一片叫好声,高速公路公司却大呼“亏不起”。据报道,某西部城市高速公路投资公司负责人称,希望政府能出台补助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而广明高速公路相关负责人则提出:“是否能让我们的收费年限延长一些?”

## 节假日免费高速路有何“亏不起”

节假日高速路免费通行,民众拍手叫好,唯独一些路桥公司、高速公路发出了异样的声音。先有高速公路公司负责人表示,这漠视了高速公路公司知情权,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接着又纷纷传出高速路“亏不起”的声音。而在这些“叫屈”背后,则是高速公路公司抛出的财政补贴、延长收费年限的论调。

高速公路居然好意思说知情权被漠视,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表示“希望节假日免费的政策调整能透明运转”?公众就不解了,在高速公路的收费上,到底谁的知情权被漠视?谁的账本没有透明运转?高速公路收费是为了还贷,但巨额路桥费究竟去了哪里,有多少拿来还贷,又有多少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公众知晓吗?而全国那些超期违规的公路收费,又有几多?这些似乎都是一笔“糊涂账”,因而,若要说知情权被漠视,恐怕也轮不到高速公路公司出来说话。

至于“亏不起”的苦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石油行业的炼油亏损论,作为赚钱能力远超其他央企的中石化、中石油,每年都要拿炼油亏损说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早有人指出,中石化、中石油所谓的炼油亏损不过是“左手转右手”的问题,两大油企把开采板块和炼油板块分开,中间用国际油价来进行定价。尽管,这个油是自己卖给自己,而不是卖到国外。这样做的好处便是:自己永远都能处在“亏损”之中。炼油亏损论的不断“叫屈”,换来的则是国家对中石化、中石油的财政补贴。

“两桶油”的炼油亏损论很容易取倒,高速公路的“亏不起”也经不起推敲。且不说这次免费的四个节假日总共只有20天,而且还仅限于7座及以下小客车,就算有所影响,也很有限。有行业报告认为:以2011年收费公路上市公司的利润表为基础,依据通行费收入占营业收入80%、小客车收入占通行费收入50%两项参数测算,节假日免费后行业收入的负面影响约为2.2%,行业净利润的负面影响为5.6%。

而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中13家公布的2011年年报显示,其平均毛利率高达56.08%,最高的重庆路桥毛利率甚至达到了91.14%,暴利甚至超过了房地产和茅台,成为当之无愧的最赚钱行业。如此暴利之下,节假日免费让利3%~5%只是九牛一毛,又何来“亏不起”?

因而,值得警惕的是,千万不要被“亏不起”的“叫屈”所蒙蔽,这只是垄断企业的一贯手法,其用意很明显,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补贴和优惠政策,以继续维持其暴利地位。节假日免费,让高速公路多少会损失一点利润,习惯了暴利的他们自然心有不甘,于是又提出了延长收费年限的荒唐想法。这一方面表明要想从既得利益集团身上“割肉”,让利于民,必然导致其反弹;另一方面延长收费年限显然与收费公路违规及不合理收费专项清理活动相违背,其理由既站不住脚,也有悖公路姓“公”、理应还路于民的大趋势,根本不值得考虑。 李龙

国家层面的车改方案,终于呼之欲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官方网站消息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拟订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实施方案。因为即将实施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已经以法规的形式对车改作出规定,也就对车改方案的出台形成了倒逼效应。

## 公车改革给点期待给点耐心

在各地车改模式层出不穷、一些地方多年车改未解决实质性问题、民众对货币化车改颇多争议的情势下,国家层面的车改,可能更带有“顶层设计”的性质,能够引领车改的正确方向。是以,公众对这一车改方案会给予更高期待,同时公众也需要一点耐心。

此前公众之所以对一些地方的货币化车改表示担忧,就在于这是新一轮的权力自肥,补贴收入畸高,同时公车可能照坐。显然,如果货币化车改变成了全体公务员畸高的职级梯度补贴,即使能让公车大量减少,车改也仍然难以实现公众眼里的公平。推行货币化补贴时,如何体现补贴的公平性、合理性,使各方满意,恐怕大有学问。

上述条例确定了车改的社会化方向,表明货币补贴不是唯一途径,因为社会化的实质,就是公车服务由社会承担,以公车租赁的方式为公务用车出行服务。车改的社会化价值取向,在于减少了现行公车的大量隐性耗费,以市场的方式提高效率。那么,其间的关键就是公车租赁必须充分市场化。如果一地都是一家垄断,恐怕公车租赁的价格同样畸高。

这些年,网络上晒出不少外国公车私用的案例。事实上,与此相匹配的是其公务员有相对较高的年薪、公务接待、公车用度等就必须变成个人开支。如果我们硬性要求所有地方都只保留两三辆公车归主要首脑用,其他公车一律取消,可能并不现实。

在这样的情势下,提高车改社会化的集约度,可能是一个更现实也更能取得共识的选择。这个集约度就表现在,各地都只保留极少数公车,其他人公务用车则完全按市场规律租赁,或者科学测算公务用车量对应的公款耗资,再以货币方式补贴个人。这样,就不能能较大程度降低公车支出,也能贴近公务用车实际,同时提高效率、减少各种隐性耗费,使货币化补贴既讲科学又讲公平。 吴乔

8日,新华社刊播一条特稿《台风需要新理念——上海防御“海葵”见闻》。文章说,记者在采访中听到防汛人员的一句话很受启发:“防台风,十防九空很正常。但每次都要作最坏打算,落实最严防御。”台风有不确定性,但防台风“只有确定性”,以生命安全为第一,绝不能心存侥幸。

上海防台风新理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防御方案依据“最坏可能性”;可撤可不撤,以撤为主;防台风:细节决定成败。

我们从字面上不难看出,所谓防台风新理念,其实是灾害学中的常识。问题是,这些年我们一些地方在发展观上出现了偏差,导致原本属于常识性的理念被扭曲,被忽视,被忘却。比如说,抗灾救援中,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绝不能心存侥幸。救灾先救人,人命关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比如说,作最坏打算,落实最严防御,细节决定成败。这是无数自然灾害留给人类的教训,这难道还要重申吗?

现实告诉我们,尽管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各个行政领域,但是每每到了操作层面、执行环节,总有落实不到位、思维跟不上的缺陷。做表面文章者有之,心存侥幸者有之,高高在上者有之,把城市形象看得比生命还重者也有之。

令人欣慰的是,从8日凌晨开始,伴随着强台风的登陆,一场裹挟着新理念的抗台风大战在各个“主战城市”激昂展开。

我们看到,上至城市的主管部门,下至各家媒体平台、公务微博,无不第一时间向民众传递真切的关怀、真诚的告诫、真实的信息。光江苏省防汛指挥部就向市民提醒短信5026万条。这是以前很少见到的全信息抗灾时代,坐在家中,坐在火车上,甚至千里之外,都能以最快速度、最透明的资讯、最符合个人需要的内容,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理念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对接,反映了现代城市的治理者,已经完成了从宗旨到终端的能力培训。

我们看到,每个城市的抗灾预案,都反复强调一个温暖人心的目标:不伤人,尽量少死人。不惜任何代价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可撤可不撤的,撤;可防可不防的,防;可保可不保的,保。因灾造成人员伤亡失踪的灾情要

第一时间报送。这种将人民的生命价值放在一切价值之上的防灾救灾理念,不仅体现文明的社会价值观,更是政治伦理的形象展现,有助于提升公共道德,凝聚人心。抗灾中的正能量,正源自于此。

我们看到,上海、南京、杭州,无数公众自发形成救援互助队伍,在微博上喊话,在大街上穿行。他们突破了传统的组织救灾形式,奏响了另一支主旋律。我们以碎片面突出公职救援,大力颂扬因公牺牲,聚焦英雄事迹,现在,我们的城市也把赞歌、鲜花或者抚恤金,献给那些伸出援手的私家车主、农民工、民营企业的小白领。我们的社会,正在通过天灾的淬炼,锻造公民思想,形成社会合力。

我们还看到,在政府的“劝导”下,大部分学校、单位给员工放假;外企老板提前放下属回家“躲台”,网上还贴出“企业关爱员工排行榜”;网民自发在微博上发起了“台风天不叫外卖”活动;一个向善的驱动力,通过政府主导、媒体倡议、企业响应、公民传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为和谐社会注入健康的因子。

西凤



## “死都不下基层”的矫情

很难想象,此类微博竟然出自一位来自湖北农村、在校享受过助学金的女博士。一片诟病声中,当事人终于在微博上致歉了,也许这是舆论压力使然,也许这是良心发现使然,但原因都不重要,倒是那些“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的句子,生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向教育,刺向形形色色的调研,刺向某种与基层相关的断裂。

这个管当事人吁求“请大家尽管这个不成熟的学生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但真正要反省的不是女博士。

从基础教育到中等教育,从高等教育到精英教育,这么多年的耳濡目染,教会的竟然

是对贫困地区的“傲慢与偏见”,起码很难说这样的教育是成功的。不能指望所有的被教育者都能如凤凰浴火重生,但如女博士般的抱怨,果真是偶发事件吗?

更值得反思的是所谓各色课题调研。很难想象,在要吃要住、要车要购物的情绪下,“有关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课题”能有怎样的进展。这恰恰是一种可悲的悖论:欠发达地区对精英求贤若渴,而高高在上的教科研就号准了脉,将各色“调研”弄成例行的“打秋风”,无助于地方发展不说,反而折损了政效能。这样的调研,和公费出国何异? 高校科研有多浮躁,看看各色下基层的课题含金量也可见一斑。

还是当地团委官方微博说得好,“我们理解,生活条件短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差异给当事人带来的困扰,在个人微博上抱怨也算人之常情,不必上纲上线。但是一个博士生在调研中,没有对欠发达地区民生的关注,只是一味抱怨物质条件,我们很难想象,这将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农村出身的博士,摇身成为鄙夷贫困地区的“吐槽姐”,抛开道德层面的抒情不说——此般传奇,才是最值得研讨的“社会课题”。

邓海建

## 用对话机制化解拦飞机困局

事实上,每次纠纷之后,航空公司和乘客往往都各说各的理,乘客说没有得到及时的解释和赔偿,航空公司说早就做了解释、并安排食宿……因而,建立一个中立的纠纷裁决机制,尤为迫切。

因为没有公正的第三方裁决机制,最后往往就稀里糊涂地“私了”。而多数情况下,“拦飞机维权”者相较于循规蹈矩者,总能获得更多照顾,如金钱补偿、优先安排食宿和优先安排替代航班等。这种处理方式等于变相纵容了“拦飞机”的不负责行为。

要彻底改变这种“闹大得利”的处理模式,需要一个中立的“对话机制”。比如,由机场、

航空公司、乘客、法律人士等组成一个裁决委员会。如果乘客对延误后的服务或赔偿不满,事后可向该委员会进行申诉,由委员会来作出公正裁决。

当然,这就要求相关制度能跟得上。比如美国2009年出台的法规规定,飞机在跑道上的等待起飞时间超过2小时,乘务员必须向旅客提供饮用水和点心等等。

民航部门可以在推动成立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出台更为细致的飞机延误之后的管理规定,这样,只要航空公司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对无理纠缠的乘客就不必用钱来息事宁人;而那些服务确有问题的航空公司,也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欣文

不但自己被双开,还要有牢狱之灾,自己请托的几位“关系人”也都一一丢官、受处分,这大概是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上辈子都没想到的“稀罕事”。

## “中山舞弊案”重典是遏制公考腐败利器

不就是为孩子的就业前途动了点私心,玩了点“手段”?人之常情嘛,象征性地处分一下就不多了,如此大动干戈,何必呢?

我们预设的这个心理活动是不是符合梁国影本人,不能肯定。但我们可以基本肯定的是,在相当多的“萝卜招聘”丑闻中,当事官员常常拿这个逻辑为不法之举辩解。正因为此,公招不断上演“前腐后继”的闹剧,拼爹拼娘的社会风气大行其道,深层原因就在于:舞弊的风险和成本有限,而获得的利益值得这些腐败者铤而走险。

但这个风险与利益的“传统性价比”正在发生倾斜。公考舞弊,将有可能付出“中山式”的空前代价。

据8日有关媒体报道,帮儿子违法更改公务员考试成绩的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已被检察院提起公诉;中山市农业局局长陈锦标被建议免职,副局长何金寿被免职。更改成绩的中山市人力资源考试院科员撤职调离,另有两名面试官被免职。6日下午,中山市政府新闻办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山市人社局副局长吴锐代表中山市人社局向社会鞠躬道歉。

查处和道歉,代表了社会的正义,用当前流行的语言,叫“正能量聚集”。查阅以往类似事件的处理,中山此次事件的查处力度可谓空前,用“史上最严厉”的,也不为过。该案从发现线索到纪委调查、到发布结论,到检察院介入,再到全程向社会公布,仅用了短短7天时间,查处决心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折服。

只要看看关于此次事件的舞弊过程,这样的重典惩治并不让人意外。“量身定做”“明目张胆”“官官相护”“肆无忌惮”……这样的性质色彩很极端的词汇,用在“中山舞弊案”上,一点也不夸张。可见,以梁国影为代表的公招腐败行为,确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不仅让普通的老百姓义愤填膺,也让体制中的正义力量责无旁贷。不施以重典,不足以震慑类似的权力狂飙。

公招腐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破坏,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无以复加。广大民众深盼这一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还就业、上升的社会通道光明畅达。

中山市这次“大开杀戒”,动用刑律惩治这类犯罪,除了法律因素外,我们还应体会到基础文明的恢复,已然成为一个城市主政者的执政理念。这种以权利平等意识、遵守规则的契约精神和社会公平等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基础文明,是每个城市迈向现代化的奠基石,缺少它,这个城市必然离和谐社会渐行渐远。

“中山舞弊案”的重典惩治,赢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叫好,也肯定会震慑一批有相同私欲的干部。如果看做是一次舆情测试,那么,它给我们所有城市的启示是:做一件有利于社会公正的事,所能赢得民心的速度,要比任何一项形象工程快得多。与其责怪我们的百姓牢骚太多,还不如积极消弭引发民怨的种种不正之风。人心向善,正基于此。 东风

据《新京报》报道,云南巧家爆炸案此前认定的“嫌疑人”赵登用也是被害人之一,策划实施爆炸案另有其人。而那位曾用“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担保赵登用是嫌疑人的巧家县目前尚无官员因此被追责。

## 法律不相信官员的赌咒发誓

事实上,从巧家县公安局局长信誓旦旦地“担保”消息披露之日起,公众质疑的声音就没有停息过。如今,昭通市公安局通报的侦破结果,不过是证实了公众当初的疑问而已。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案情通报,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结论不能过于武断,法律面前只可讲“证据”,不能讲“担保”,法律从来就不相信官员的赌咒发誓。

公安机关办案若想经得起推敲,首先应该讲证据,还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只有建立在确凿证据基础上的结论才会让人信服。当巧家爆炸案尚在调查之时,巧家县公安局局长杨朝邦就直接“打包票”宣布嫌疑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程序的僭越。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官员的态度看起来越“坚定”,则其与真相的距离就可能越遥远。

其后,杨朝邦以“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的做法,更显荒诞。毕竟,局长的官帽、个人的前程不能替代案件的证据;权力的宣示也不能逾越程序正义。

如此滥拍胸脯、赌咒发誓,一方面,反映出时下一些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习惯性的漠视证据、先入为主的作法。在他们看来,证据云云,不过是一种从属于预设结论的工具,而非通往真相的坚实台阶。

另一方面,这一行为也暴露出,个别官员试图以此阻碍公众对于真相的追问,进而遮蔽真相。

因此,当整个事件真相大白之时,不仅仅需要警方的一声道歉,还需要深入探究隐藏在爆炸案后面的深层原因,也就是,新认定的犯罪嫌疑人为何对拆迁征地补偿不满?这其中有没有公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占?

同时,还应该从制度层面深刻反省,并启动对相关官员的问责,以减少、乃至杜绝这种赌咒发誓的风气。此前,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公开力挺“周老虎”,喊出“拿人头作担保,虎照是真的”的言论,朱巨龙后被停职,杨局长呢?

办案还是要讲证据、讲程序,“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当年论及做学问的这句话,用在这里,也是合适的。少一些“说十分话”,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多几分缜密,多一些平和。 胡印斌